

一部反映全国实际收藏情况的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杨殿珣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天文台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组成了“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他们普查了全国地方志，以及二十五史，明清实录和其他古籍中的天象记录和天文史料。在普查全国地方志的过程中，认为编辑一部能够反映各图书馆和各收藏单位收藏地方志的实际情况的目录很有必要，因而编成了这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联合目录的编制，是以朱士嘉先生编的1958年商务出版的修订本《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他们把《综录》印发给各有关单位，请他们对自己收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对、修改，并加以补充。这本联合目录，就是根据各单位核对、修改和补充，进行整理编辑而成的。

这本联合目录的第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参加的单位比较普遍，收录的方志种类比较多，基本上反映了全国收藏的实际情况。参

加的单位计有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共图书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图书馆和博物馆、文史馆、文管会、档案馆、档案局、出版社、资料室、文化馆等一百九十多个单位，其中只有台湾省部分，是根据《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联合目录共收录我国历代方志（截止至1948年）八千二百余种，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卫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所志、关志、岛屿志，还有具有方志初稿性质的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中国方志综录》修订本共收方志七千四百十三种，收藏单位为四十一个。两相比较，联合目录在种数上增加了八百多种，收藏单位为原来的五倍，能够反映全国收藏的实际情况。

这本联合目录第二点值得提出的是，编者根据方志的具体情况，用著录以及附记等各种办法，把方志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出来。

方志一般都有原刻本、重刻本、补刻本的区别。补刻本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订，往往是在原卷的后面，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原来的修纂人有时并不变动，因而在明代修的方志，可能有清代的纪事，如万历年修的《朔方通志》，记有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事；崇祯年修的《隆平县志》，纪事到康熙末年；重刻本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给使用人以错觉。有时续修人利用原来的版片，作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把原来的修纂人姓名，改题为续修人的姓名，这样也会造成著录上的混乱。

这本联合目录对于上述情况，都一一分别记录出来。例如：

〔康熙〕平谷县志三卷，任在陞修，李柱明纂，康熙六年刻本。

〔雍正〕平谷县志三卷，任在陞原修，李柱明原纂，项军倩续修，雍正六年增刻本。

〔乾隆〕平谷县志三卷，任在陞原修，李柱明原纂，项军倩续修，朱克闵再续修，乾隆四十二年再增刻本。

又如：〔光绪〕通州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分别著录为光绪五年刻本，光绪九年、十五年递增刻本。〔道光〕蓟州志十卷首一卷，分别著录为道光十一年刻本，咸丰二年补刻本。

另外，还有同书异名，卷数分歧，全本与删节本，全书与局部等等情况。

同书异名的情况，如清代七十一纂修的《西域闻见录》，有的题为《遐域琐谈》、《西域琐谈》、《异域琐谈》、《新疆纪略》、《西域记》、《新疆舆图风土考》、《西域总志》等等不同的名称。

卷数分歧的情况，如上面所举的《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西域记》为八卷，《新疆舆图风土考》为五卷，《遐域琐谈》、《西域琐谈》、《异域琐谈》、《西域总志》为四卷。又如明正德年康海修的《武功县志》，正德年刻本、雍正年刻本、四库全书本、三长物斋丛书本、清芬堂丛书本均为三卷，而万历年刻本却为四卷。由于有三卷四卷的两种刻本之不同，所以孙军烈的评注本也有三卷本与四卷本的不同。

全书与删节本的情况，如《西域旧闻》、《西域纪略》、《新疆撮要录》都是《西域闻见录》的删节本。

全书与局部的例子，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的《新疆纪略》为《西域闻见录》的卷一和卷二的另刻本，《外藩列传》为《西域闻见录》的卷三和卷四的另刻本，《新疆风土记》为《西域闻见录》卷七的另刻本，《军台道里表》为《西域闻见录》卷八的另刻本，传钞本《西域昆探》为《西域闻见录》卷一至四的另刻本，乾隆年刻本《新疆外藩纪略》为《西域闻见录》卷三至四的另刻本。又如：光绪年刻本《新疆建置志》四卷，光绪年铅印本《新疆国界志》十六卷，《陶庐丛书》本《新疆藩部志》六卷，《新疆小正》一卷，《新疆礼俗志》一卷，《新疆山脉志》六卷，宣统年铅印本《新疆交涉志略》六卷，《新疆访古录》一

卷，新疆官书局印本《新疆物候志》一卷，《新疆兵事志》二卷等，都是〔宣统〕《新疆图志》的一部分。还有辑录〔宣统〕《新疆图志》中的建置志、人物志、实业志的钟录所撰的序文为《新疆志稿》、《西疆备乘》，单行出版的。

以上所举的种种情况，在《联合目录》里，都经编者核对原书，详分缕析的作了著录，并加以按语作了说明，可见编者是付出了不少辛勤劳动的。

这么一部包括八千多种方志的目录，由多人的手编辑而成，当然也难免有体例上不够统一，以及有些项目还需加以说明的地方，在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1. 《四库全书》所著录的方志，在联合目录里都收录了，在版本项下著有乾隆间《四库全书》本的便是。但在联合目录里，在宋朱长文修《吴郡图经续记》下面，没有著录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又万历《四川总志》三十四卷，仅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存目三，并未收入《四库全书》，而在联合目录里，著录有《四库全书》本。

2. 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间，曾影印了《畿辅通志》、《山东通志》、《湖北通志》、《湖南通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等六种，每种后面都附有四角号码索引，在联合目录里，仅在影印民国《湖北通志》下著录附有四角号码索引，而在影印光绪《畿辅通志》、宣统《山东通志》、雍正年修《浙江通志》、光绪《湖南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等的下面，并没著录附有四角号码索引。

3. 咸淳临安志一百卷，其书流传既久，往往缺佚不全。在各家藏本后，注明存卷情况是有必要的。《四库全书》本存九十三卷，也应注明存卷情况，不然，便与咸淳刻本的注有些矛盾了。又如延祐《四明志》二十卷，、《四库全书》本十七卷，缺九至十一卷，也应加以注明。又〔乾隆〕钦定《热河志》一百二十卷，

《四库全书》本八十卷，〔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卷首一卷，《四库全书》本一百二十卷，这类卷数互异的，也应加以注明。

4. 联合目录凡例第五条载：为便于查阅，本目录按纂修年代或记事所止之时间在书名前冠以年号，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有的所冠年号，似有可商榷之处。如〔乾隆〕《江南通志》二百卷卷首四卷序目一卷，乃雍正七年尹继善等奉诏重修，于雍正九年之冬开局，乾隆元年书成。冠以乾隆年号，似不如冠以雍正为得其实。又如〔民国〕《湖北通志》百七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乃宣统年修，纪事亦系至宣统三年止，冠以民国，似亦不如冠以宣统为宜。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无关大体，目的是希望精益求精，对于读者更加方便，幸勿以吹毛求疵视之。

我们知道，方志的记载是包罗万象，内容是很丰富的，近年来利用方志资料作研究工作的，如普查天文资料、地震资料、物产资料、矿产资料、民俗资料、方言资料、农民起义资料等等，都以方志所载作为参考。随着科研工作地开展，将来会有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参考方志的记载，一定有许多未经被人注意的宝藏，要被开发出来，所以方志的利用，是会与日俱增的。这本联合目录，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使研究工作者可以按目而求，减少许多重复劳动，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1985年12月21日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